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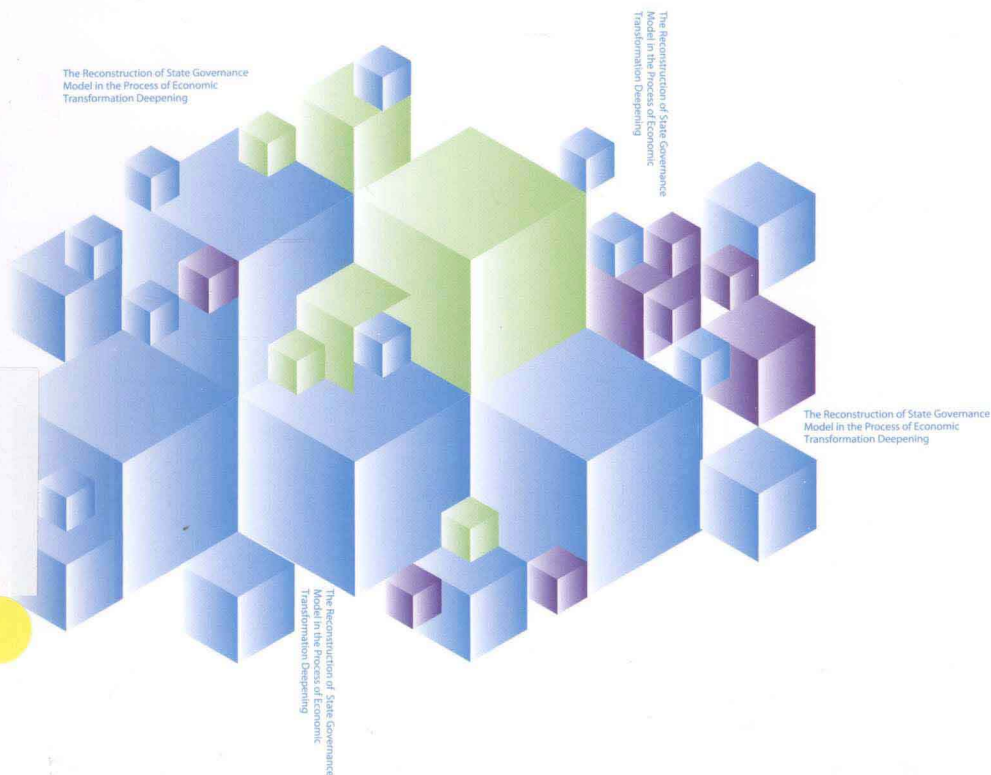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景维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eepening

经济转型深化中的 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景维民 张慧君 黄秋菊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丛书

国家社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eepening

经济转型深化中的 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景维民 张慧君 黄秋菊 等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景维民等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096-2491-3

I. ①经… II. ①景… III. ①经济改革—影响—国家—行政管理—研究 IV. ①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8342 号

组稿编辑: 王光艳
责任编辑: 王光艳 杨雅琳
责任印制: 杨国强
责任校对: 陈 颖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2491-3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言

20 世纪末，发生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制度变迁过程。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转型不仅导致经济体制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且引发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革。转型之初，许多人抱有一种极度乐观的态度，认为转型国家只要彻底抛弃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可以迅速跳跃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并实现社会经济的持久繁荣；但现实表明，经济转型远比人们的预期更为复杂，转型持续的时间也必然大大延长。时至今日，虽然主要转型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无论从制度运行效率还是经济发展质量来看，这些国家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成熟完善，更为重要的是，转型国家尚未形成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互惠共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互惠共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是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深化阶段面临的关键任务。本书以国家治理模式重构为切入点，系统研究了转型国家发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深入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路径演化轨迹以及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并构建了一套评估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的指标体系，对转型经济体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进行比较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型深化阶段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战略选择。本书的特色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借鉴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构建一个相对统一且具备较大理论兼容性的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理论模型与历史事实在一般层面上总结出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规律、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必要条件。

第二，对转型国家现代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基本特征、运行机制、治理绩效和路径演化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比较、归纳和总结。其中，尤其归纳和提炼出中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三种典型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路径，并对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路径的主要特征和演化轨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提出总体性



思路、基本的框架设计以及可行的政策建议。

第三，针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复杂特性，提出了“广义制度关联性”这一分析性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深入剖析了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以及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制度关联与优化问题。

第四，建立了一套综合反映和测度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政治稳定性与政府能力、市场有效性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性与社会发展3个领域的26个具体指标合成，能够对转型国家整体的国家治理质量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从而为我们对转型经济体的国家治理模式及治理质量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实证基础。

第五，紧紧把握经济转型的时代脉搏和最新进展，深入分析了最近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转型国家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探讨了转型国家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演进趋势和战略抉择。

参与本书写作的课题组成员长期从事转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已经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其中，许多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对于“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这一宏大主题而言，我们的研究仍然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正因如此，书中不免会存在疏漏或不妥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景维民

2013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经济转型深化的新议题：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1
第二节 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主要论题：基于相关研究的述评	6
一、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趋势和特征	8
二、国家治理模式重构中的治理危机	16
三、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构建	19
四、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大分化	23
五、对相关研究论题的评述	26
第三节 本书的分析框架和技术路线	28
一、本书的分析框架	28
二、本书的技术路线	36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	43
一、本书的理论意义	43
二、本书的实践价值	46
三、本书的创新之处	47
第二章 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	49
第一节 国家治理模式的缘起：制度与经济发展	49
一、经济发展理念的演变	50
二、增进发展的制度变量	58
三、从制度构建到国家治理	66
第二节 国家治理模式的结构与关系	70
一、国家治理模式的制度内涵	70
二、国家治理模式的制度构成	73



三、国家治理模式诸要素的内在关系	87
第三节 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机制	89
一、国家治理模式的动态演化模型	90
二、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宏观历史叙事	94
三、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应注意的问题	98
第三章 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优化	103
第一节 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及阶段性特征	103
一、经济转型的准备阶段：从改革到转型	104
二、经济转型的启动和推进阶段：变革与调整	107
三、经济转型的深化和完善阶段：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	112
第二节 经济转型深化阶段面临的治理任务	113
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完善	113
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115
三、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变革	120
第三节 广义制度关联性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123
一、广义制度关联性的引入	123
二、广义制度关联性与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	132
三、广义制度关联性与国家治理模式的优化	140
第四章 经济转型深化中国国家治理质量的测度与评估	145
第一节 国家治理质量测度的依据和原则	145
一、国家治理质量测度的必要性与理论基础	145
二、国家治理质量测度的原则	153
三、构建国家治理质量测度指标的方法讨论	155
第二节 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的选取和构建	165
一、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监测指数的总体结构	165
二、指标的合成及相关说明	173
第三节 转型经济体国家治理质量的评估与比较	175
一、政治稳定性与政府能力评估	176
二、市场有效性与经济发展评估	177
三、社会稳定性与社会发展评估	178

四、国家治理质量的综合性评估与比较	179
五、国家治理模式重构中的问题及启示	181
第五章 中东欧转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185
第一节 中东欧传统体制下的国家治理模式	185
一、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186
二、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特征和绩效	198
三、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与瓦解	203
第二节 中东欧转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206
一、政治变革的先导性与竞争性民主体制的确立	206
二、经济变革的激进性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210
三、回归欧洲的紧迫性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220
四、国家治理模式重构与中东欧的转型绩效	222
第三节 中东欧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面临的挑战	232
一、政府能力的恢复和巩固	232
二、加入欧盟后的经济赶超	233
三、经济社会发展与新福利国家建设	236
第六章 俄罗斯转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243
第一节 俄罗斯传统体制下的国家治理模式	243
一、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244
二、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特征和绩效	247
三、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	252
第二节 俄罗斯转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256
一、不完善的民主化与弱政府治理模式	256
二、混乱的市场化与畸形的市场经济体制	259
三、急剧的社会变革与分裂的社会结构	261
四、盲目的国际化与依附性经济发展模式	265
五、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无序性与转型危机	268
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面临的挑战	269
一、稳定制度环境与建立强政府	270
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273



三、社会发展与公民社会建设	277
第七章 中国转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281
第一节 中国传统体制下的国家治理模式	281
一、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282
二、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特征和绩效	284
三、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	291
第二节 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与调整	294
一、政府目标偏好的灵活调整	297
二、政府制度和能力的持续构建	298
三、经济转型路径与策略的合理选择	303
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深入协调	305
五、稳健的国际化与国家竞争能力的提升	307
六、国家治理模式的有效调整与中国的转型奇迹	309
第三节 中国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构建	314
一、化解政府悖论，建立法治化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315
二、培育市场，创建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	317
三、扶持社会，构建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	319
第八章 全球化与后危机时代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趋势	323
第一节 冷战格局与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同构性	323
一、冷战的形成与全能主义国家兴起的外部压力	324
二、摆脱不平等国际秩序与国家自主性的强化	326
三、冷战结束对国家治理模式演变的影响	328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关联性	331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及其基本特征	331
二、经济全球化与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变革	334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机遇和挑战	337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	340
一、全球金融危机对转型国家的冲击	341
二、后危机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	345
三、走出危机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	346

第九章 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结论与启示	357
一、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	357
二、若干重要启示	365
参考文献	371
后记	391

第一章 导 论

20 世纪末发生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涉及多个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转型的一个深刻后果就是促使这些国家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发生巨大变革，政府、市场与社会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面临深刻重构。国家治理模式变革产生的制度重构效应不仅成为影响转型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也成为导致转型路径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时至今日，大多数转型国家已进入经济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在此阶段，能否建立一种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互惠共生的有效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依然是决定转型国家能否确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持续均衡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

本书以国家治理模式重构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和分析了转型国家所发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体现了一种“大转型”的系统性研究视角和新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转型的整体性路径演化轨迹，深刻洞察转型进程中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并在转型深化阶段探寻有效的制度改革战略。研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不仅为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支撑，也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创建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长点。

第一节 经济转型深化的新议题：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些重大的变革进程激起阵阵波澜。它们不仅剧烈地改变着既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结构，而且也在深刻地重塑着社会成员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从而标志着社会的整体跃迁。发端于 20 世纪末的大转型（Big Transformation）是其中颇为壮观的一幕。



在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盛行了几十年之后，苏联、东欧以及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踏上转型之路。从狭义的视角来观察，转型意味着从高度集中、封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度分权、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其中主要涉及所有制结构、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宏观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协调机制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广义的视角来观察，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转型或“市场化”，它还包括了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等方面的广泛变革。从这个角度讲，转型意味着国家治理模式的整体变革与重构。

在某种意义上，转型既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尽管许多观察家早已意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但几乎没有人预期到它的瞬间崩溃。在 1982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苏联经济的一项研究中就明显透露出这样的看法：“本研究有三个发现值得强调：首先，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持续地滑坡。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苏联确实会持续增长。其次，经济绩效很差，存在很多违背经济效率标准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经济就失去活力或动力。最后，尽管苏联经济的成就与其计划之间存在鸿沟，但是退一万步讲，我们认为苏联经济的崩溃只有极小的可能。”^①正是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牵扯，加之“有限理性”的制约，使得人们难以事先规划好一个完整的蓝图和纲领，以及时准确地指导转型进程，这也充分反映出大规模制度变迁所特有的复杂性。

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为多重制度的共时性变革，以及由此决定的改革议程的多样性选择。在许多转型国家，经济制度的变迁往往同时伴随着其他领域的制度变迁。这些制度变迁主要包括民主化与民主的巩固、社会变革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对外关系的转向以及民族国家的重新构建等。多重制度变革共时性推进，显然大大增加了转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素，因而需要转型国家根据特定的历史与现实环境约束，合理安排改革议程，以避免陷入秩序混乱的改革陷阱之中。改革者不仅需要谨慎而明智地选择变革的时机，适时推进必要的制度改革，而且需要理性地安排好改革的时序，把握好改革的速度和节奏，从而将多重制度变革塑造为一个相互衔接、相互支持、互动协调的可持续性过程。

此外，转型还体现出一种阶段性演化的特征。如果我们将视野拉长，那么不

^① 迈克尔·麦克福尔. 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 [M]. 唐兴贤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9.



难发现,转型肇始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Reform)。在“去斯大林化”国际背景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探索通过局部分权和引入市场机制的方式来修正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这种有始无终的局部改革未能扭转体制效率衰竭的命运,但是却为未来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制度遗产和必要的变革准备。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在原有制度环境的严重禁锢被彻底去除之后,“创世纪”般的制度改革试验在转型国家全面推开。由于涉及体制结构、利益结构乃至意识形态结构的剧烈重构,因而衰退、分裂和动荡成为这一时期诸多转型国家鲜明的时代特色。伴随着转型的深入推进,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一些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在竞争中胜出,新的认知模式开始形成,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也相应进入一个制度稳定时期。与此同时,在不同国家,转型的路径、绩效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体制也出现了“大分化”的趋势。时至今日,经济转型进入到一个深化与完善的崭新阶段。在主要转型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得以初步确立,市场已经替代计划成为协调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机制。支持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制度环境因素也已逐步确立。转型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大大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日益加深。

尽管如此,转型并未终结。世界银行在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曾经对转型的目标做出了如下界定:“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以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市场化仅仅是一种手段、一个过程,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普遍受惠于市场化的成果,从而使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以这一标准判断,那么许多国家的转型显然正行之途中。虽然从某些改革进展指标来看,一些转型的“领头羊”国家(如加入欧盟的中欧国家)已接近于建立起西方模式的“完全的市场经济”(Complete Market Economy),但在其他大多数转型国家(如苏联国家),无论是制度改革、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绩效仍然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去甚远。即便是那些所谓的“转型明星”,其所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也非稳固,因而在面临内部和外部风险冲击之时,仍显得十分脆弱。这一点在刚刚得以控制,但尘埃尚未完全落定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由此可见,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深化与完善社会经济体制的过程。由于原有的制度变革任务还未完成,而新的挑战又不期而至,因此转型国家又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任何成功的经济转型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也不是仅仅依靠单一的经济改革就能一步到位的变革进程。相反,经济体制的变革,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必然要建诸于适宜而稳固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之上。其中,一个具备充足治理能力的有效政府以及一个和谐而团结的社会结构,是确保经济平稳、高效发展的坚固制度外壳。当缺乏这一外壳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抑或我们可以想象的第三种经济体制,都将无法有效运行,甚至会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正因为如此,建构一种政府、市场及社会相互扶持、互惠共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是转型国家跨越转型鸿沟,建立起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①

然而现实表明,在转型国家重构一种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要比人们的预想更为复杂曲折。已故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 1996 年发表的《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中,曾经设立了一个理想的转型目标——“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这多少代表了转型国家所希冀的理想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不过,连同俄罗斯在内的许多转型国家却不同程度地陷入另一条相反的路径——分裂的社会、衰弱的国家、混乱的市场经济。这种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协调失灵所形成的治理危机,成为导致转型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长期衰退的重要根源。在经历了严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开始反思原有转型战略的弊端,并试图通过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将国家引入一条持久繁荣的有效路径,其中一些转型国家取得了相对良好的绩效,而另一些则仍旧在危机中长期挣扎。

在转型世界的另一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东方超级转型大国——中国,在 30 多年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转型道路。持续的快速增长、日益开放的市场已成为标志“中国奇迹”不争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保持转型秩序稳定的基础上,政治与社会更加开明和开放。在此过程中,一种“强政府”主导下的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国家治理格局也已初步形成。当然,“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②也尚未完成,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构成中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重险阻。除了经济层面的持续性改革外,更为深层的变革需要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加以稳健而有效地推进。由此看来,在所有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议程不仅早已伴

^① 张慧君,景维民.从经济转型到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转型深化与完善市场经济的新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10(2).

^② 这一评价源于一本西方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最新写就的著作的题目。参见劳伦斯·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方颖,赵扬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随着转型的发动而展开，而且也必将在转型深化阶段成为一个核心而关键的制度构建议题。

从理论层面来看，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显然为我们理解转型、研究转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角。它不仅关注转型国家经济层面的变革，而且关注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变革，以及这些变革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体现了一种“大转型”的系统性研究视角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转型的整体性路径演化轨迹，深刻洞察转型进程中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并在转型深化阶段探寻有效的制度改革战略。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制度转型，也顺应了国际社会科学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逐步兴起的“国家回归”的学术研究潮流，体现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研究理念，那就是立足政府、找回国家，但又不将经济和社会踢出去。^①换言之，对转型的理解将以国家（或政府）的目标偏好、组织制度、治理模式、能力构建等结构性因素的变迁为切入点，同时兼顾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克服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经济简约主义”的弊端，真正打开国家治理的“黑箱”，为理解长时期、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提供一把有用的钥匙。当然，由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涉及诸多变量的调整、诸多结构关系的转换，因而需要统筹兼顾、全面考量，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进程也更为漫长而曲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国家治理模式重构问题的研究可能不会像物理学那样成为一种因果关系确定、数理逻辑严密的“硬科学”，而更像是一门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国家构建的艺术”。^②

① 从 20 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行为主义、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方法的兴起，“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被从以政治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中剔除出去，而在解释政治和政府行为的过程中采取了社会中心主义的方法，甚至政府也仅仅被看作是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博弈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平台。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以西达·斯考克波、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开始重新重视国家的行为主体身份，并关注国家如何通过特定的政策与经济和社会进行互动，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过程。这一学派被称为“国家回归学派”。参见 [美] 彼得·埃文斯等. 找回国家 [M]. 方力维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9；相关介绍还可参见杨龙. 西方新政治经学的政治观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76-80.

②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M]. 黄胜强，许铭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6.



第二节 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主要论题： 基于相关研究的述评

恰如菲利浦·基弗所言，“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滑溜溜（Slippery）的概念”。^①在某种意义上讲，治理可以松散地指代人类社会现存的一切组织、制度、机制等结构形态，然而当这一概念的外延过于宽泛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以确切地把握它所具有的实质性涵义。

就经济学而言，治理概念的引入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密切关联。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这篇经典文献中，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用它来解释人们为何将原本可以在市场上从事的交易活动转移到企业这一科层组织内部来加以实施的原由。在这里，交易成本是指在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谈判、计量以及实施等活动的成本。^②此后，交易成本被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③并将其作为建立制度选择与经济绩效之间联系的关键枢纽。其中，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E. 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将影响交易成本的大小，并由此决定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来规制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④从此，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治理的基本涵义就变成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合约选择、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果是在一个经济组织内部，那么治理更具体的作用就是缓解或克服委托—代理问题。^⑤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交易成本的普遍存在，因而治理机制也广泛地产生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既包括市场中的治理，也

① Philip Keefer.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EB/OL].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C/HIINDGLOECO/Resources/CE_Ch07pp.189-218_FINAL.pdf.

② 蒂莫西·耶格尔. 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 [M]. 陈宇峰，曲亮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6.

③ 或许，对交易成本最为宽泛的定义当属肯尼斯·阿罗所谓的“制度运行的成本”。

④ 奥利弗·E. 威廉姆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 [M]. 段毅才，王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⑤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6-37. 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除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着不同的目标偏好这一原因外，还有就是由于信息问题、计量问题等因素引发的高昂交易成本。



包括企业和公司内部的治理，还包括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的治理。

与经济学角度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政治学中，治理原本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的涵义相似，主要是指政治权威主体如何运用权力对其所辖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加以“控制、引导和操纵”。^①但是，伴随着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化，治理所具有的涵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理已经不再是政府权威机构的“专利”，其他各种公共和私人部门都可以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来，以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自主的网络”和“多中心治理体制”。正因为如此，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这一研究报告中，给治理下了一个内涵极为宽广的定义，即“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②

由此可见，在对治理内涵的理解中，经济学视角和政治学视角实际上侧重于两条不同的路径。经济学视角侧重于治理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从人类个体的基本行为假设出发（如自利性、有限理性等），借助交易成本这一中介性变量来界定治理的基本功能，进而推演出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各种治理机制。而政治学视角则侧重于治理的宏观形态；也就是从政府（或政治国家）与经济及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来界定维系公共秩序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手段、方式和过程。在本书中，我们将兼顾经济学的微观视角和政治学的宏观视角，将国家治理模式界定为：在一定领土范围之内，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其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各自都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组织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在微观层面，它们发挥着协调社会成员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降低交易成本、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功能；在宏观层面，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大治理主体则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

①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②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